

“内圣外王”之新解

——以熊十力“内圣外王”思想为中心

聂民玉,段红智

(保定学院 政法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从文献来看,真正发挥“内圣外王”之旨的主要还是儒家。“内圣外王”也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这种新道统论虽然有所承于传统儒家道统论,但亦有其现代的新意涵,民主与科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论传统儒家道统论还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大都主张“内圣”开启“外王”,坚持“内圣”与“外王”的一致。熊十力虽对“内圣外王”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但仍然局限于此。“内圣开出外王”的命题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人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概率几乎是零。其实,内圣与外王不一不二,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会得到改造。也就是说,不是“内圣”开出“外王”,而是在“外王”的过程中,改造自身,以外王的事业功效充实心性道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圆满的内圣人格。

关键词:“内圣外王”;儒家;新儒家;新道统论;熊十力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2-0010-07

一、“内圣外王”之内涵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内圣外王”一语,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篇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489}认为百家只各认“大道”之一曲,不识“道”之大全,故“道术将为天下裂”。此“裂”字用得好,意指百家擅用典法,都自以为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故导致百家殊方,诸侯异政,各有所“蔽”。此“完整”“整体”之“道术”被撕裂。从文献来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都有“内圣外王”之道的表述,就连“名家”如惠施从逻辑得出的“天地一体”,其背后也孕育着“泛爱万物”之价值判断。当然真正发挥“内圣外王”之旨的主要还是儒家。

关于“内圣外王”的最原初表述,我们可以追溯到孔子。“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

收稿日期:2016-01-26

基金项目: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中国哲学”(2013)项目资助;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熊十力经学思想研究”(HB12ZX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聂民玉(1970-),男,河北唐县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易学思想研究。

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215]“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亦即“内圣外王”。“修己”是“内圣”,而“外王”则是“安人”“安百姓”。孔子的本意是“内圣”的人才能“外王”,根据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16]孔子的意思是,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圣主”,才能引导天下人修身,从而达到天下大治,政治清明,意即“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言外之意,连一个自己都缺德的人,怎么能治理他人,更别说治理好社会、国家了。可见,孔子“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17]把道德的重要性提升到北斗星的高度,因此,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他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即“为政以德”,才能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即“以德代政”,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和永久的魅力。也就是说,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可以说,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这就是一般儒者的思维逻辑。

“内圣外王”不但是传统儒家的纲领,也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成为新儒家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冯友兰在一篇文章中开篇就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318]这种“新道统论”虽然有所传承于传统儒家道统论,但对“外王”赋予了更多的新意涵,即把“科学”与“民主”加于其中。关于“内圣外王”的涵义,现代新儒家们有不同的看法,冯友兰与熊十力也是一样,通过对“内圣外王”涵义的不同理解,表达了他们自己不同的政治理想。

关于“内圣外王”之个中含义,笔者认为冯友兰先生对“内圣外王之道”说得最为透彻精彩,他说:“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319]也就是说,唯有“内圣”的人才配做王,而哲学其功用就是使人成为“圣人”,也就是说哲学的功用就是使人不断地对人生“觉解”,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笔者认为这是对“内圣外王之道”之“内圣”与“外王”逻辑关系最通俗的解释和说明。

熊十力对于“内圣外王”之“圣”和“王”也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新理解,可以说成一家之言。他说:“圣者,智仁勇诸德皆备之称。王者往义。物皆向往天平,其愿望无已止也。”^[4132]“圣”就如孔子所讲的“三德”同时具备,即具有“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就是这种境界,才可以配为“圣人”。“内圣”就是指自己具备这三方面。“王”的意义不是“帝王”之“王”,而是“向往”之“往”。他说:“王之之言,以其为万物之所共同向往之道。故此王天地万物。修己之功,极于成圣。圣者,与天合德之称。故学至内圣而止矣。然成己即赅成字,不是帝王之王。切勿误会。”^[5170]他说:“孔子为儒学大祖,其道内圣外王(内谓己,外谓物,非可斥物于己之外也。成物极乎天地位,万物育,而圣学之全体大用始彰。故言内圣必兼显外王。王者往也。物莫不归往乎圣道而远于恶,是谓之王)。数千年来,在吾国学术思想界恒居正统之地位。”^[61585]熊十力对“王”之新解,不同于冯友兰的解释,颇具新意,“天地位,万物育”是人所向往之道即圣道,内圣是“成己”之道。言外之意,内圣的人,才能有“天地位,万物育”的愿望和悲悯之心。有了这种愿望和悲悯之心,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实现“外王”之大道。有了这种政治理想,就有了实现这种理想的动力和冲动及愿景。

二、“内圣”与“外王”的一致

熊十力明确指出“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他说:“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4467]他把孔子的哲学分析为改造主观世界的“成己之学”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成物之学”两部分,这充分表明了内圣是外王之本,而外王与内圣又确为一贯的立场。当然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客观世界也得到改造,反之亦然。熊先生给的答案

是,从“天地万物为一体”或者“天下一家”出发,就能够实现平等,天下大公;从“群龙无首”出发,就能实现人心和谐,涵养心灵,成就自己。并且明确指出“外王学”之本在于“内圣学”,换句话说,“内圣”能够开启“外王”。他说:

《大易》之内圣学,不许离现实世界而别求有所谓超越万有的寂灭实体,如佛氏之涅槃界。要在于现实世界而了悟其有实体。如是者,不起空见,不作虚无想,不生厌离欲故。此即外王学,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弘纲,所由立定。而经纬万端之大业,所由开展。天下一家之规划,决定实施……言外王之本在内圣学,其要旨在是也^[7]。

自《大易》明体用不二之义,天帝消灭于无形中,六经之革命思想,当可灌输庶民而解其蔽乎。惜乎小儒改窜六经,而群众无门,然《大易》首破天帝,荀卿犹申其旨,外王学之无君,本于内圣学之无神。孔子自述“吾道一以贯之”。宜深玩也^{[7]453}。

“内圣学”就是要正确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源、根据,即解决本体论、心性论诸问题的学问,其目的就是要成己成物,实施的途径就是要靠“笃实践履”即道德实践来完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熊十力不但明确指出了“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而且还明确指出“内圣”能够开出“新外王”。“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也关系到传统儒学能否现代化的关键问题。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保留儒家之“六经”的神圣地位,认为六经即为“内圣外王”之学。熊十力反复强调成己成物,成己就是内圣学,成物就是外王学。成己就能成物,反过来,成物才能成己。为什么成己就能成物,或者说为什么内圣才能外王。熊十力又反复强调:“哲学不是空想的学问,不是徒逞理论的学问,而是生活的学问……哲学者,非不切人事之学也……人者不能离社会而存,不能离政治而生。”^{[6]242}。也就是说,哲学并不远离“人事之学”,言外之意,哲学并不疏离社会与政治,并且指出,哲学家是以变动光明、感发其同时与异世之群众的。他说:“每一时代的大哲学家,其精神与思想恒足以感发其同时与异世之群众,使之变动光明。”^{[6]242} 总之,熊十力仍未摆脱以“内圣”开“外王”,以道德决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模式。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以“大学之道”的内容为依据,用图说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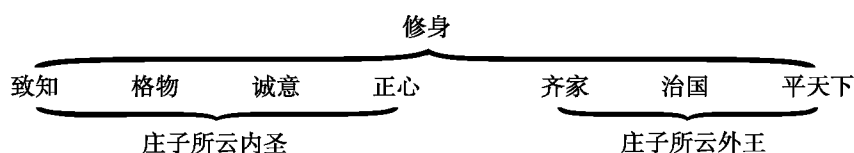


图1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通过这个图式,可以看出,熊十力认为君子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却要内外交修即“合内外之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是内修之德目,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修之纲目。

“内圣”与“外王”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内圣”是“因”,“外王”是“果”,还是“外王”是“因”,“内圣”是“果”,还是即因即果。如果“内圣”是“因”,那如何修成“外王”之“果”?

熊十力从他的“体用不二”出发,提出了“内圣外王不二”,即内圣与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论。“体”没有“用”即是顽空,“用”没有“体”就失去方向,“内圣”没有“外王”就流于空疏,“体”和“内圣”是“用”和“外王”的“本”。所以可以说,熊十力的经学是人生的,也是宇宙的,是宇宙人生的合一,也就是说,人生论向上翻,就是宇宙论、本体论,而宇宙论、本体论向下翻,就是人生论,两者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内圣”与“外王”并重,在熊先生看来,“内圣”之人,一定能开启“外王”,熊先生的意思是说,他的理想人格就是“内圣”与“外王”并重。

熊十力认为“内圣学”是“外王学”之本,为什么内圣就是外王之本,这其中之环节,熊十力也没有说清楚。言外之意,“内圣”怎么才可以开出“外王”,或者说,“内圣”与“外王”如何统一,这一直是儒学的难题,当然这也是熊十力难以绕过去的问题。熊十力又反复说明内圣与外王的一贯。他说:“故个人

成己之学,不可为独善、自私之计,而成物为至要矣。然己若未成,又何以成物?故内圣、外王,其道一贯,学者宜知。”^{[7]337}这个问题,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找到了一个桥梁,那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来实现,实现其“政统”“学统”即民主与科学。

一般说来,以“内圣外王之道”来概括儒学精神,也是康、梁以后的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主导思想。但从牟宗三、杜维明等论儒学的思路看,狭义的现代新儒家尤其重视“心性之学”“成德之教”“为己之学”,即“内圣”一面,要求“自内圣向外开以重建其外王之道”。故王邦雄在《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中总括说:外王是“术”,内圣是“道”,要通过“道”来开出“术”,来定住“术”。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就是民主科学如何透过内圣而开出外王,此内圣要在儒家^{[8]29}。

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了其师熊十力的工作,致力于以传统儒学的“内圣”为基,努力在“外王”方面有所成就,挖空心思来证明“内圣”能够开出“外王”,实现其“返本开新”的任务。他说:“什么是‘内圣’呢?就是内而治己,作圣贤的工夫,以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人品。‘外王’就是外而从政,以行王道。”^{[9]309}在现代社会,“外王”主要表现为“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牟宗三认为,“现在讲外王与事功,乃集中在科学与民主”^{[10]88}。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儒学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牟宗三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说:“我曾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说中国文化,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说西方文化,现在可说‘理性之运用表现’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的方式,‘理性之架构表现’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的方式。”^{[11]51}

然而,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出”“理性之架构表现”呢?也就说如何在具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的基础上吸纳“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牟宗三给出了一条途径,这条途径不能采用“直通”的办法,而只能采取“曲通”的办法。牟宗三说:理性“要自己逆,要自我坎陷,不可一味顺。……故凡辩证的发展,必须由此逆的一步”^{[10]102}。

在牟宗三看来,这一“辩证的发展”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良知”为什么要“自我坎陷”呢?根据牟宗三的解释,作为“德性主体”的“良知”是“与物无对”的“无执存有论”,居于优先地位,而“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则是“与物有对”的“有执存有论”,居于从属的地位。因此,为了“转出”“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来,“德性主体”就必须由“无执”“下落而陷于执”,“不这样地坎陷,则永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12]127}和“政治主体”。而“认知主体”的建立是发展科学的“内在根据”,“政治主体”的转出成为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的基础。

牟宗三对儒学的未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提出了“三统并建说”。牟先生一方面通过“道德之肯定”来保住儒学的道德地位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来实现儒学的自我转化,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到社会实践上去,既能保住儒学之地位,又能应对现代化即“民主”与“科学”的挑战,开出“新外王”。牟宗三建构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通过“曲通”“良知的自我坎陷”,“内圣”就能开出“外王”。

三、对“内圣”与“外王”一致的评价

现代新儒家不管是熊十力还是牟宗三都主张“内圣”能够开启“新外王”,但问题是,“内圣”是无法开拓出“外在事功”的。外在的事功,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内圣学”是道德的形上学,而“外王学”,在熊十力看来,“孔子外王之学,用时下的名词来说,就是他对于政治的社会的理想”^{[5]107},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民主”与“科学”,即熊先生的社会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其动力已严重不足,也就是说“体”开“用”的力量不足。

事实上,儒学早已存在由内倾走向封闭的倾向,层层归密,步步惊心,直指内心,已无力改造世界,也无心关注世界,已没有改造世界的雄心和力量,“成己”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成物”了。我们知道,

“内圣外王”需要一个桥梁,熊十力认为,“外王之道不托空言,存乎向往之真,见诸行动实践”。他说:

内圣者,深穷宇宙人生根本问题,求得正确解决,笃实践履,健以成己,是为内圣学。外王者,王犹往也,孔子倡明大道,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物之本,以天下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此皆依于大道而起作为,乃至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人道之隆,可谓极矣。此非偶然可至。浩浩宇宙,芸芸万类,共同戮力,向往大道,健而直趣,无有不遂。故外王之道不托空言,存乎向往之真,见诸行动实践。实践不力,何能成物?王之义为往,富哉斯义!外王立名,取义在一往直前,深可味也。^{[7]337}

熊先生看到,如果实践不力,就不能成物。关键是“内圣”的人,如何见诸行动实践,实现“外王”。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由爱亲敬长而推之于人民,推之于社会,在客观上须要一种有力的桥梁。”^{[13]708}这个“有力的桥梁”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或者说,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现代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绝不能随心所欲,异想天开,只有“内圣”了就能实现“外王”。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内圣”的规模和内容也要扩大和深化,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实现“新外王”更是一句空话。因此,只有把“内圣”的内容凝练成一种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内心”,才可能实现真“外王”。熊十力也没有找到这个“有力的桥梁”。

牟宗三提出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一提出就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唐君毅的门生霍韬晦在其发表的《第三代新儒家能做些什么?》的论文中说道:“牟宗三先生即曾提出‘良知自我坎陷’以开出‘新外王’的说法,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但我认为这一说法虽已能正视其间曲折,但似乎仍然未能就良知、民主、科学、法制等关系作一充分的层构与分疏。因为一般人认为儒家所成就的道德生活(内圣)与西方文化所成就的社会生活、政治构架、科学知识的源头不同。”^①霍韬晦就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新外王”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未能就良知、民主、科学、法制等关系作一充分的层构与分疏。中国台湾“鹅湖学派”诸子之一的林安梧也对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理论提出批评。他说:

我认为这里便隐含着内圣与外王的纠结,须得进一步去梳理。当代新儒家虽明示旧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并且提出一颇富争议的“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阐明“开出”民主、科学的可能。这样的论点于我虽颇有启发,但我总觉得这并未真切去正视良知所隐含的“专制性”与“咒术性”,只是乐观而主体主义的高提良知,并经由理论构造的方式,以一辩证的转折而显示由良知开出民主与科学有其“实践的必然性”……至于牟先生所举的“良知的自我坎陷”之提法,我则判之为“咒术性的转出”。这只是长久以来专制传统之互解的一个转折点而已,并不是就足以转出。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的提法仍待进一步楷定,甚至互解与重建,才能有一新的发展可能。^{[14]14-15}

林安梧认为“良知”所隐含的“专制性”与“咒术性”及制度痼疾,不足以开出民主与科学。结论是“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论,已在现代新儒家内部趋向自我消解,画上了休止符。现在开来,这只不过是一套“概念游戏”,要开早就开出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因此,“民主”和“科学”从西方学就行了,但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传统。

刘述先用“理一分殊”作为现代诠释的观念、原则、理论构架,依据一种历史的经验和逻辑,说明儒家理念能“表现”出科学与民主。他说:“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维持我们对于仁、生、理的终极关怀,但我们要觅取它的现代表现,就不能不对传统展开彻底的批判,才能够走得上现代化的道路。”^{[15]533}刘述先也对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提出疑问,指出新儒家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是不错的,而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医治的良方。他说:

①见香港《法言杂志》,1991年2月第1期。

儒家的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并不一定是合拍的。而新儒家思想在当代之所以缺乏真正的影响,是由于它在现实上始终提不出可行的办法来。^[6]

虽然“内圣”开出“外王”在“治道”实践中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但现代新儒家们始终坚持这一梦想,坚信“道德实践的主体”能够开出“政治的主体”与“认识的主体”“实用技术上活动之主体”,即“内圣”可以开出“外王”。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教授的《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宣言》一文明确地阐发了这个问题。他们说:“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展现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为在政治上,能自觉为——‘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上活动之主体’。”这就把现代新儒家所提倡的“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道,从哲学、文化引向政治、历史,从讲坛上、书斋里的“心性之学”外化为社会政治实践。总之,从“道统”引向了“政统”和“学统”。

我们知道,在现代新儒家的语境中,“外王”更多的是指“民主”与“科学”,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内圣”并不与“外王”相悖,或者说“中学”并不与“西学”相冲突,正如郭齐勇先生所说的,“儒家社会与儒家学理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资源”。他说:“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代表人物都重视接纳西方近世以降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多有创获。他们在政治诉求上并不保守,在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建设(例如宪政)上,在以德抗位,批评权威方面绝不亚于自由主义者(例如胡适)。梁漱溟、张君勱、徐复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建树……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概念,学术界有多方面的讨论,亦成为当代新儒学的又一向度。我认为,就自由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必须具有的道德勇气、担当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社会与儒家学理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资源。”^①郭齐勇的这段话,虽然难免有夸大之词,但也说出了儒学的气度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总之,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是道德决定论和道德至上论,难免有以德性吞没知性,以内圣取代外王,要好人不要能人之嫌。熊十力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目睹革命党人争权夺利,不肯在身心上用工夫,致使革命失败。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军阀混战,道德沦丧,促使他走上了以“学术救国”的道路,而放弃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以为通过宣讲儒学的“内圣学”,使人们“正人心”,从而影响世风,改造社会,开出“新外王”,解决辛亥革命所没能解决的问题,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可以说,熊先生找不到可以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现在可以断言,也许“内圣开出外王”的命题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人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概率几乎是零。儒学的“成己成圣”,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自律”,全凭个人的自觉,可是现实中的人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自律”没有“他律”的保障,“自律”就容易流于形式,并容易导致社会日益走向虚伪、腐化与堕落。可以说,在思维格局上,熊十力仍拘泥于将主体认识与主体实践,将人自身的修养与人对世界的改造打成两截的思维模式。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模式是有严重缺陷的。其实,内圣与外王不一不二,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会得到改造。也就是说,不是“内圣”开出“外王”,而是在“外王”的过程中,改造自身,以外王的事业功效充实心性道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圆满的内圣人格。

参考文献:

- [1]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①参见郭齐勇先生于2003年2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 [4]萧楚夫.熊十力全集:第六卷[M].武汉:湖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5]萧楚夫.熊十力全集:第八卷[M].武汉:湖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6]萧楚夫.熊十力全集:第四卷[M].武汉:湖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7]萧楚夫.熊十力全集:第七卷[M].武汉:湖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8]傅永聚,韩钟文.儒学与西方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9]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0]牟宗三.人文讲习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1]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1.
- [12]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牟宗三先生全集(2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 [13]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例[M]//新儒家学案: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14]林安梧.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一些思考[J].孔子研究,1999(1):14-26.
- [15]刘述先.“理一分殊”的现代诠释[M]//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533.
- [16]刘述先.当代新儒家的观念游戏?[M]//哲学思考漫步.台北:三民书局,1995.

New Explanation of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Taking Xiong Shili’s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as the Focus

Nie Minyu, Duan Hongzh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is the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life ideal. From the point of literature, who can really exerts the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is Confucian.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is the new theory of the New Confucian, which not only has its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eory meaning, but also has its modern new implications, and includes democracy and science also. Regardless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eory or the theory of modern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mostly advocate “Being Sage Inside” leads to “Being King Outside”, persist in the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same pace. Although Xiong Shili is the person who puts forward the new ideas about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still be confined to the opinion about the “Being Sage Inside” leads to the “outer kingliness”. Although the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can be set up in theory, and everyone has the possibility of to be a sage, on the reality the rate of the possibility of its realization is almost zero. In fact,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are differ not two, when people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world, the subjective world will also be transformed at the same time.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the “Being Sage Inside” leads to the “Being King Outside”, but during “Outer Kingliness”, we can improve ourselves, and use the consequence of “Outer Kingliness” to enrich our mind, so we can improve our moral level, and achieve our ideal and perfect personality.

Key words: “Being Sage Inside and Being King Outside”; Confucian; new Confucian;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Xiong Shili

(责任编辑 石丽娟)